

# 我们为什么抗战？

——为保卫自己的祖国

——为保卫世界的文化

——为保卫全人类的福祉

郭沫若

东方有一大群疯狗，这一大群疯狗便是日本国飞扬跋扈的军人。

日本的军人，尤其他们的领导者，他们自幼年时便受着偏颇的军事教育，他们的头脑异常简单，除掉侵略、占领、轰炸、屠杀之外，没有其他的词汇。他们自中东之战，日俄之战，屡次的战役获得了战胜的甘饵以来，他们只知道战争的利得而不知道战争的惨祸，这，早昏迷了他们作为人而存在的良心，他们是把人的血液当成为醇酒了。

欧洲大战对于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势渐渐地失掉平衡，日本的军人便愈加跋扈起来，他们在他们的本国是早已施行了军事的统制的。连那号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连生存权都时时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设的日本，是早已窒息

了。

日本就在这一大群的狂暴军人的统制之下，在吐放着他们的毒气。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不仅是想吞灭我们全体的中国，而且是想混一我们整个的世界。这，我们是明确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具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们晓得，人类的福祉是在人类生活得到理智的统制时的和平状态之下所建设起来的。人类自脱离了兽域以来，他的目标是正确地向着人类的协和泯除着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偏狭的传统，尤其个人所禀赋着的先天的兽性而前进着的。以往的人类文化是这样建设了起来，今后的人类文化也当这样建设起来。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宗替我们建设了四千年的文化，以仁义为大本的文化。这文化我们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使日本人早于千年以前脱掉原始的界域，和我们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我们中华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内，曾受过一度原始民族，满洲人的蹂躏，受了他们的无理的统制束缚，聪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残，因此，对于世界文化几乎没有丝毫的贡献。然而深赖欧美民族在和平的统制之下建设了新兴的科学文明，补偿了我们的陷缺。这文明又由欧美民族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使日本早于五十年以前脱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欧美人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军部统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是毁坏文明，摧残人类福祉的飞机大炮，毒气细菌！

日本的狂暴军部是世界文化，人类福祉的最大的胁威，这，是明而且白的事体。

不仅我们中国民族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是整个人类都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过往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谋人类福祉，费尽无数心血所创建的文化利器，都为日本军阀所逆用，用来毁灭我们全人类了。

我们中国民族本着他爱好和平的素质，我们被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现在提着正义的剑，起来了。我们不仅是为要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为要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抗战，我们并且是为要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抗战。

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我们的意志却很坚强。我们也明确地知道，日本军部的强悍是因有日本经济为粮台，而日本的经济基础是奠设在我们中国身上的。我们中国能制日本经济的死命，同时也就是能制日本军部的死命。古语云：“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我们要拼弃我们的一切，至少是要达到与日本军部同归于尽的一步。

我们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存权，牺牲了自己的祖国，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得到保障，我们能遂行着这种使命，我们是感觉着无上的光荣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您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全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歼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草于上海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

（原载《抗战》三日刊）

※

※

※

※

# 一、芦沟桥抗战

## 芦沟桥前线采访追忆

陆 诒

芦沟桥事变距今四十三年，检视旧存采访笔记，新闻已成历史。现追忆当年亲身经历，略记史实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袭击芦沟桥、进攻宛平县城的炮声，不仅震醒了全中国人民，也用事实昭告全世界，日本侵略者决不以侵占东北三省为满足，还要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

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就是及时赶到战云密布的华北，把危机真相告诉广大读者。七月十三日上海《新闻报》派我赴平、津采访，在北站登车之前，我已从站长室获知日军占领天津东站的新闻，铁路当局对这趟列车能否到达平、津，亦无把握。列车经济南时，始知到天津时将停靠总站。十五日上午十时到天津，总站虽尚未被日军公然占领，但荷枪实弹的日军已在天桥上站岗放哨，空中也有日机侦察。下车走出总站，见日军三五成群，忙于征用公私车辆，抢运军用物资。

就在我到津的前晚，即七月十四日晚上八时，天津日军一千五百人，包括步、骑和炮兵部队，从海光寺兵营开出，

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当行抵东马路时，架枪在马路旁休息，附近居民因天热乘凉，见日军开到，聚集围观，日军恼羞成怒，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举枪作瞄准状，居民纷纷逃避，日军始耀武扬武而去。这时北宁路沿线天津至山海关一段，除原有日本驻屯军一个师团之外，新调来天津的有原驻朝鲜的第十师团四千多人，其先头部队由川口少将统率，尚有由坂垣统率的第五师团亦将来津。关东军佐藤师团此时已越长城古北口向北平郊区集结。中国军队因受《何梅协定》（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后何应钦和梅津少将签订的停战协定）的种种限制，不能布置防御，事实上，平、津两地早已门户洞开，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当时著名的汉奸如刘桂堂和白坚武等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策划组织暴乱。北宁线上，日军调兵遣将，军运频繁，但在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上还常刊载宋哲元、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和天津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等云集于此，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单是和平的幻想实不足以掩盖平、津所处的危急！

在天津稍作停留，翌日即到北平。这里除白天常见日机作编队飞行掠空而过，晚上遥闻日军在郊外进攻的枪炮声之外，商店照常营业，市面仍保持镇定。但交通要道堆满沙袋，警察严密布岗，晚上实行戒严，商店都在晚上八时提早收市。戏院及娱乐场所营业不佳，中山公园、北海、中南海和故宫游人大减。我曾约三、五友人，到中山公园绿荫深处品茗，虽茶座遍贴“莫谈国事”的警告，但邻座茶客仍纵谈时局危机，语极激昂。北平大、中学校虽值暑假，大部分留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忙于组织抗敌后援会、慰劳团等团体，进行紧张地工作。妇女团体则组织救护队，加紧训练，并为前线战士缝制布鞋、衬衫，日夜加工，不稍懈怠。当时中国共产党

的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提的抗日救亡号召，正密切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十八日下午，我驱车出宣武门至彰仪门，城门半开，二十九军战士严密把守，力劝记者勿再前进，谓城外大井村已被日军占领，经解释后放行，继续徒步前进，到大井村时果为日军哨兵所阻。折赴永定门外南宛，经过大红门时，曾与二十九军战士谈话。据他们说，前不久曾与日军发生武装冲突。最初，有日军三辆卡车疾驶而来，我军上前制止，日军不仅不听，反开枪射击，我军当即奋勇还击。第一辆卡车司机中弹受伤，车辆撞树倾覆，其余二辆狼狈退去。此后，日军即不敢再向大红门守军任意挑衅。

从北平郊区的局势来看，证实日军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北平。当时逃离北平的人们，大都搭平绥路支线的火车，先到门头沟，再到长辛店，换搭平汉路火车南下。我在十九日上午出发到芦沟桥前线采访，也是走这条路线。

门头沟距长辛店仅四十华里，有小毛驴和洋车可以代步，经过小坡儿和卧龙岗两个小山岗时，还是要靠步行。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芦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芦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到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

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芦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芦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辞别王县长，经过一小时奔波，始在简陋的驴马饭店中觅得一宿之地。当晚，蚊虫与跳蚤联合进攻，难以入睡。二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芦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

思日军常到芦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连日，北平青年、学生和妇女团体到前线慰劳者络绎不绝。其次是士气高昂，空前未有。官兵在作战中负伤后，都不愿后撤，认为若一撤下火线即丧失此千载难逢的抗敌机会。例如我团金营长，大腿给敌军炮火打伤了，我叫他回后方就医，他坚决表示，要带一连人战死在芦沟桥上。中国有此民心和士气，深信我军抗战必胜！”

从宛平县城再回长辛店时，芦沟桥畔枪炮声又起。在长辛店旅馆中，巧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中外新闻摄影社记者小方，相互交流情况。长江认为时局重大消息此刻在平、津和保定三地，而不在芦沟桥前线。他建议我速返平津采访谈判消息，他自己则将赴保定，了解后方的军事部署，相约不久在保定重晤。

二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见日机十七架越城南飞，据说是飞往芦沟桥一带侦察我保安队换防情况的。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经过与日方谈判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后，下令把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调离前线，另以一百三十二师赵登禹部接防，芦沟桥前线则调冀北保安队程希贤旅驻守。这次军事调动，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十二日结束。二十三日上午，宋哲元还对集合在北平天坛附近的冯治安部一旅人训话，一再解释撤兵换防的苦衷，声言这是我方最后的让步，如对方不同时撤兵，则不惜与之作最后周旋。训话后，官兵情绪悲愤，不能控制，有的



人竟失声痛哭。

天津的形势更比北平紧张。北宁路沿线的丰台、杨村和天津东站，已被日军公然占领，铁路运输完全由设在天津东站的日军兵站司令部控制，专为其进攻的军事需要服务。我第二次到津时，亲见市内中原公司附近洋房，有好几幢都用白布大书《满铁第二宿舍》字样，被日方占用，里面住满了满铁员工，为即将接管平、津一带的铁路运输业务作准备。在日本租界，日方可以任意捕人，关进日军司令部。即使居住华界者，日方当时也为所欲为地开出黑名单二十多人，通知天津市政府协同缉拿。最荒谬的是日军原在津郊东局子设有军用机场一处，但尚不满足，最近又划宜兴埠和李明庄一带农田数百亩，增辟军用机场两处，强把这一带农舍和农作物夷平，农民受此灾祸，虽一再向地方当局呼吁请愿，都无结果。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以上事实直认不讳，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和平第一步已告圆满解决，而且获得的和平是无条件的。当场就有记者问他：和平既有第一步，试问第二步是什么？他顿时语塞，想了很久，才支吾其辞地说，那是善后问题吧！可见此处兵临城下的危局，地方当局在国民党中央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仍不惜委曲求和，苟延残喘。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张自忠所部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不驻天津市区而驻在郊外，忍让日军在市内横行霸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二十六日我离北平赴保定时，已悉高丽营和昌平一带发现日军，平绥路感受威胁。单从平汉、平绥、北宁和平通（即北平至通州）四条交通要道的形势来看，北平的命脉已经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再侈谈镇静，只能欺骗自己。二十七日晚，我和范长江、小方、还有北平《实报》的记者宋致泉得

到我军全线应战的消息，即于二十八日上午一同出发赴长辛店。到车站时，获悉孙连仲所部二十六路军将开到保定增援，长江遂留驻保定采访，我和小方等仍照原定计划登平汉路客车北上。车抵良乡，距长辛店还有二十五里，前线炮声已清晰可闻，到达长辛店时，月台上都是军人，其中有十几个刚从前线救护下来的伤兵。有两位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的盟员，汗流浹背，军装湿透，还到处奔走，逢人就大声疾呼：“前线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我军正在进攻丰台！”前线传来稠密的枪炮声，证实了这次战斗远比往日的接触更为激烈，人们兴奋极了。这时，小方即和我匆匆告别，跳上铁路线上的铁甲车，要驰赴前线，摄取我军反攻的镜头。

我与宋致泉直奔设于长辛店大街的宛平县政府办事处，当时县长王冷斋已去北平，所有紧张的工作都由秘书洪大中处理。洪原为北平新闻界熟人，对我们冒着日军炮火来到此地，极表欢迎，既为我们安排食宿，又为我们借军用电话传递消息，当时北平到长辛店电报已中断。

当天下午有日机两架，对长辛店进行扫射、轰炸。此地距芦沟桥最前线仅五里，在过去三周中，一切前方供应和运输事务都靠宛平县承担，说得更具体一点，都靠长辛店来解决。自从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以后，仅有北平至门头沟、再由门头沟至长辛店这条路可通，当地还有平汉路上规模最大的铁路机厂，不论从战略意义或交通价值上说，长辛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芦沟桥事变以来，当地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和防空洞等等，一点都没有。每遇空袭，地面上只有少数步枪还击，日机欺我不设防的弱点，即低飞投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任意残杀我军民。事之痛心，曷甚于此！

当晚八时，日军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长辛店大街，炮声震耳欲聋，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证实炮弹已落于近处，我们即随办事处人员到附近一家商铺的地窖中躲避。二十九日清晨，整装待发，秘书洪大中特赶来劝阻，并转告确实消息，略谓从二十八日起，日军已对平、津两地同时发动全面进攻。日军突袭北平南宛我军驻地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卒应战，损失惨重。天津市郊也发生大战。宋哲元、冯治安和冀察政委会一部分军政要人即于当晚撤离北平，独留张自忠处理危局。冯治安已回部队，指挥作战，宋哲元则直接赴保定。全线我军正在调防应战，情况复杂多变，他建议还是取道门头沟回北平，了解全局消息最重要。我们即辞出，到长辛店车站时，又遇刚从前线归来的小方，谈了部队指挥混乱、各自为战的情况。

上午九时，我们三人向门头沟方向前进，走了五里，遇见不少难民从门头沟退回，都说门头沟到北平的交通，已被日军切断。不得已仍折返长辛店，适遇日机十五架前来轰炸、扫射，其中有七架沿铁路线南飞，紧追不舍。幸当时沿线青纱帐起，这是最好的天然掩护，我们在高粱田中继续步行南进，安然脱险。过良乡、窦店，走了七十里到琉璃河车站，才搭上平汉路客车返保定。

保定下车，时已午夜。城门紧闭，路上戒严，只好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中坐以待旦。三十日早上进城，先到保阳旅馆找长江，他见到我们平安归来，高兴得跳起来，不久，又有七、八个南开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学生跑来，大家谈论前线见闻。他们听到平、津沦陷，南开大学校舍被焚的消息，都极度悲愤！他们说：“东北沦陷已六年，骨肉离散，音讯不

通，现在已无书可读、无家可归，只剩下一条命，就要跟敌人拼到底，打回老家去！”

这天上午，日机曾来保定侦察。保定与长辛店虽有一段距离，但敌方根据其侦察报告，即于下午一时派来五架飞机低飞轰炸。首次空中袭击，即将保定车站的一切设施炸毁，造成铁路交通瘫痪，可见在现代战争中难以划清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保定被炸时，我们都在城内，当地除曾发出空袭警报之外，别无其他防空措施，即使在车站附近也没有可供隐蔽的防空壕。事后，我们到车站察看，见到一辆原定开往石家庄的客车车顶上，机枪弹痕累累，车上还有五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附近房屋都炸成一片瓦砾。另有四辆弹药车上的军火，正在着火爆炸，电线、路轨都被炸得遍地狼籍。

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我们逐步懂得有备与无备大不一样！半月多来，从芦沟桥、长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见所闻，教育我们：在强敌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蒋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灭，当时和战大计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过光辉战绩的二十九军，由于事先没有健全的战斗布署，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等敌方调度好了，一翻脸就发动突然进攻，逼得我们仓卒应战，吃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大亏。

可是，芦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芦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一九八〇年第五辑）

#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吴锡祺 王式九

##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质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

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吗？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芦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7月30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

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8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朱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sup>平</sup>日<sup>来</sup>也没有准备讨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  
戴罪图功，誓

死杀敌，以报知遇之隆。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



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外国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8月21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